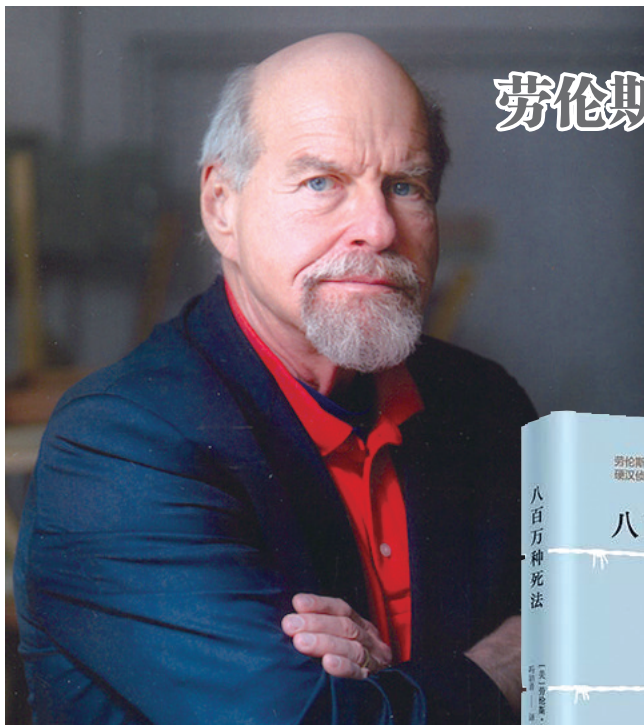


劳伦斯·布洛克《八百万种死法》:

马修·斯卡德哭了

□小 白



在劳伦斯·布洛克的《八百万种死法》中,马修·斯卡德只是不断地出没于纽约城各种不法之地,皮条客和毒贩们喜欢的酒吧餐馆,抢劫犯乐意下手的陋街窄巷,妓女们日常住的公寓,他在这类地方寻找那些身份可疑的人。提问,察言观色,有时候被揍或者揍对方。就这样渐渐接近真相,一步步找到杀人罪犯。他把这个叫做“跑腿敲门”。

这种做法,大约在二三十年代美国小说家哈米特和钱德勒的笔下真正成型。人们把这些作家塑造的诸多男主角统称为硬汉侦探。他们的道德感以愤世嫉俗的方式来表达,聪明强悍,却伴随着酗酒之类的性格缺陷,他们擅长打架,更擅长被人打趴在地。福尔摩斯和波洛那一代侦探靠天才大脑寻找罪犯,马修·斯卡德们基本上依靠一具肉身。因为他们是20世纪都市化想象的产物:危险不是来自家族内部、庄园内部、或者一个小村镇内部,危险来自一个巨大的城市。城市中有成千上万人口,其中有无数罪犯,可以制造出“八百万种”杀人事件。

而刑事侦查学呢?虽然早在上世纪30年代警察们就学会了采集指纹认罪罪犯,但远未建起一个真正可以检索比对的指纹数据库,距FBI某位特立独行、善于讲故事的探员发明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应用于罪案调查时也还早。在这种情况下,马修·斯卡德除了拿肉身在这个城市丛林中盲目滚撞,又能干什么?就像小说中的警察局,除了把现场物

证收集归档,等待罪犯下一次作案,等待罪犯和罪证自己冒出来的偶然机会,他们又能干什么呢?

劳伦斯·布洛克的这部小说虽然写作于城市管理和罪案调查技术已有突破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却承袭了一个老派的故事模式。马修·斯卡德依然像30年代钱德勒笔下的马洛那样,靠机灵反应,靠体力,主要是靠抗击打能力在犯罪故事中讨饭吃。他一路磕磕碰碰,四处打听,在电话中运用一些后来被称为“社会工程学”的技巧手法,就这样把案子给破了。这不奇怪,因为一直到下一个十年,人们才通过《沉默羔羊》和《本能》这类电影,发现警察们早已能够用另一套办法来从千万人口中筛选出犯罪嫌疑人,包含各种个人记录的数据库、心理侧写、先进的法医学取证。

但这种故事模式本身富有意味,它来自一个更具诗意的现代传统:马修·斯卡德同样是一个都市漫游者,虽然布洛克所面对的大都市,相比波德莱尔和本雅明所面对着的,有更多敌意、更多危险。在那里,坏人们在赚大钱,正派人却只能到苏荷区地下室酗酒者互助会寻求安慰。一个朋友几天不见,你就有可能在报纸本埠新闻栏杀人案件现场报道中发现他的下落。不过,无论如何也还有诗意。除了篇首引语特地借用坡的说法点出“诗意主题”(poetical topic),以及小说中有一位妓女诗人之外,男主角马修·斯卡德无论是说话行事思绪想法,作者用第一人称叙述起来都像是在做一部叙事诗,词句不甘心太过切合实际。把劲头十足的街头粗语与略显浮夸的书面隐喻混到一起,虽然依稀有一丝矫揉,但正好适合梁朝伟他们喜欢。

说到词句,劳伦斯·布洛克有一种美国私立高中或者大学低年级学生的风格。书中不时提及古希腊史诗和易卜生剧情,或者直接朗诵一段塞尔维亚·普拉斯。那些男女角色,无论是警察、毒贩、妓女、酒保,似乎都接受过不错的古典文学基础教育。这些喜欢绘画、木雕、音乐和戏剧的法外之徒,个个都像是参加过某种校园兴趣小组。我们先前提到过的,马修·斯卡德为他自己调查方法所命名的那个“屁跑敲”,英语原作中是一个马修自创的首字母缩略词:goyakod,意思是Get Off Your Ass and Knock On Door。(屁颠屁颠跑腿,一家家敲门)。这种喜欢用首字母缩略语来做隐语的说法方式,不像那个美高女学生?而那时候正与马修说着话的钱斯,那个优雅的、多少带着一点桑塔格式坎普的皮条客钱斯,一听到这个自创暗语,就像另一位美高同学,立刻心悅诚服,交了马修这个朋友。多看几部80年代美国高中生类型题材的电影,你会揣摩出那种风格来的。由此可见,在马修·斯卡德硬汉外表下,实则深埋着一颗柔软的心。

劳伦斯·布洛克所有小说中,真正的主角是那座城——纽约。他甚至给另一部小说起了个“小城”的名字,所谓小城指的就是纽约。显然,能把纽约说成小城的人,跟纽约一定是亲的不能再亲了。因为纽约挺大的,马修·斯卡德坐车到了另一个区,就不认得路。纽约就像上海,就算你住它几十年,也总有一些地方你从未涉足。布洛克把他的虚构犯罪故事安放在一座真实不虚的纽约城中,给那些真实地名添加迷人的传奇。城市是千百万人住的地方,有了劳伦斯·布洛克那样的小说家,它们才变得不俗。所以她们到了纽约,宁可按照马修·斯卡德的路线图游览;他们到了纽约,一定要找找那条街上的酒吧。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真正喜欢一座城市,不一定要写它的好人好事,把它写的险象丛生,有时候也能达到宣传效果。

总而言之,人们能从这部小说中读到城市传奇,读到纽约人的知识趣味,读到一个失意的都市漫游者,读到残酷和温情。却不要希望书中真的有一位“硬汉”侦探——无论如何,在小说结尾,马修·斯卡德哭了。

米亚·科托:我们都在不同身份间游走

□王 杨

结束了上海书展上关于旅行和文学的话题之后,8月19日至20日,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来到北京,在中信出版社主办的两场活动上与中国学者及读者探讨了“在非洲用葡萄牙语写作”和“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视角”等文学话题。

米亚·科托1955年出生在莫桑比克的贝拉,葡萄牙人后裔,上大学时加入了领导反殖民战争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米亚·科托自我选择留在莫桑比克,以记者为业,以莫桑比克为自己的国籍。1980年,他再次进入大学攻读生物环境学,最终成为生物学家,在生态学和环境保护方面做出很多贡献。在文学方面,米亚·科托创作诗歌、小说,也写作童书。1983年,他的首部诗集《露水之根》问世,1992年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梦游之地》,2009年出版小说《耶稣撒冷》,2012年出版小说《母狮的忏悔》,三部作品现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译本。2013年米亚·科托获得葡萄牙文学最重要奖项卡蒙斯文学奖。目前正致力于历史小说“帝国三部曲”的写作,第一部《女人的灰》已由中信大方引进,正在翻译当中。

在非洲用葡萄牙语写作

作为用葡萄牙语写作的非洲作家,米亚·科托创造性地将葡语与莫桑比克的民族性相结合,通过添加词缀、旧词合并等方式创造新词,使非洲口头语与欧洲葡语词汇相融合。

关于葡萄牙语与非洲文化和民族性的融合,米亚·科托介绍说,葡萄牙语在来到非洲之前已经被其他语言给“污染”了一部分,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超过400年的时间里被摩尔人占领,所以很多葡语词汇的词源来自于阿拉伯语。自15、16世纪葡萄牙往非洲南部航海以来,非洲更南地区的语言也成为葡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葡语还受到另一个语言分支巴西的影响,而巴西的葡语又受到非洲黑奴的影响。所以葡语至今仍然是在活跃发展的语言,非洲有5个说葡语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语言都在不断地碰撞与交流中。

米亚·科托认为,语言背后反映出一定的哲学和世界观。他曾多次谈到,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运用不同的语言意味着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他介绍说,在莫桑比克,除了葡语之外,还有超过25种的非洲本土语言,不仅这些语言各不相同,其背后的哲学和世界观也都

不一样。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他有时要去乡下调查,在介绍时说自己的与自然相关的工作。但在当地使用的非洲本土语言中,并没有确切的词对应“自然”和“环境”,也没有一种语言有对应“科学家”的词,而在当地语言的表达中,他们称米亚·科托为“白人的巫师”。葡语文学学者樊星认为,米亚·科托对词汇的创新一定程度上是去中心化的过程,通过运用新语言与历史对抗,这极大地加强了语言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如果更深入地看,非洲作家的葡语文学创作形成了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多元文化世界观。

米亚·科托的创作中有很多情节依靠书信、日记等书面语言呈现,他认为文字是联系历史和记忆的工具。学者严蓓雯认为,米亚·科托不仅重视书写下来的文字,同时也意识到非洲大陆上的语言还包括口头语言、文化语言以及自然语言,这些语言与非洲大地浑然一体,其中也包括沉默,就如在小说《耶稣撒冷》中,叙述者“我”被爸爸称为“调试寂静的人”。沉默可以理解为语言的不足——并不只是一种缺陷或欠缺,同时也能够揭示出一种具体的不存在。在阅读米亚·科托的小说时,有时需要触摸到他语言文字层层叠叠下面的沉默和寂静,这同样属于非洲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的一部分。

身份认同与魔幻现实主义

在写作中,米亚·科托始终探寻新独立的殖民大地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重建民族身份和记忆,同时,其主题又具有广博的普遍性,涉及女性、移民、记忆、逃离、爱与死亡,与当下世界联系紧密,语言充满诗意。葡语文学学者闵雪飞认为“他不但与文学先师卡蒙斯、佩索阿等共同构成了经典葡语文学链条,更证明了非洲大陆文学景观的独特性;每一步作品他都试图以独立于西方文明的姿态,重新解释莫桑比克的历史,寻找非洲大陆的文化身份认同”。

在两场活动中,米亚·科托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身份多元的看法以及对定义自己和他人身份的谨慎。很多时候,人们会把作家定义成一种身份,“可身份是多元的,我们其实都是游走在不同身份之间”。曾有一位刚果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了米亚·科托作品的法语译本,法语译本中肯定没有作家照片,这位教师误以为米亚·科托是黑人,对学生说,米亚·科托的作品体现了他自己,包括他父母、祖先的非洲性,并打电话邀请米亚·科托讲授怎样保持写作中的非洲性。这让米

亚·科托感到很尴尬。他以此说明,轻易地给一个人的身份下定义是非常轻率的举动。“即便我不是白人是黑人,也并不一定要天然地跟非洲历史产生联系。莫桑比克就有很多黑人作家更多的跟现代建立联系,而不是跟传统建立联系。”

学者周瓚在米亚·科托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他作为诗人、小说家、生物学家和文化思想者的不同身份。她认为,这种多重身份混合于一体使得米亚·科托对当今世界存在各种的重要问题,如种族文化、文化冲突、人类暴力、环境问题、性别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思考。作为殖民者后裔,米亚·科托不是以外来者视角书写莫桑比克的历史现实,而是将自身放在莫桑比克民族的时空之中,通过重视理解种族差异去“超越种族和文化之间的隔膜”,在作品中采取一种更加能动性的对话和交融姿态,体现了自觉的文化关联意识。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等称米亚·科托的作品为“精妙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归类,米亚·科托并不认同。之前在上海接受媒体访谈时,他就表达过“魔幻和现实这两样东西是一体的,现实就是魔幻,不存在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的看法。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对非洲人来说,现实就是梦境,幻觉是真实存在的。“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现实跟魔幻对立起来,在莫桑比克土著语言当中没有两个词来讲魔幻和现实,而是用一个词形容混起来的观念。”他认为不必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现实和魔幻,“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这个现实,那个是故事,以及这个故事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但“重要的不是分割哪些是现实的,哪些是魔幻的”,“重要的是了解现实”。

书写女性 女性书写

小说《耶稣撒冷》和《母狮的忏悔》中一个重要的写作角度或线索就是女性。《耶稣撒冷》可看作米亚·科托对莫桑比克父权制批评得最为激烈的文本。小说中的耶稣撒冷只有5个男人和一头母骡,父亲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是至高无上的家长。而葡萄牙女人玛尔塔的出现揭示出母亲朵尔达尔玛的死亡真相,使得耶稣撒冷的建构土崩瓦解。整部小说隐含着父权制度的失效,作品中的白人女性形象在讲述自身经验的同时也对父权制形成挑战。在《母狮的忏悔》中,作家的思考更深入,小说中以马里阿玛为代表的农村女性,依然是传

统、父权与性暴力的受害者,女性的诉求依然被忽视。葡语学者闵雪飞认为,《耶稣撒冷》中女性的作用是书写,这主要体现在两处:一是每章的题记都是女性作家或诗人的作品节选,二是玛尔塔的信都是纯然的女性书写。这样的设置表明,米亚·科托将女性的书写看做一条自我解放之路,可以终结父权制的残暴。而《母狮的忏悔》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种女性成长小说,按巴西女学者克里斯蒂娜·平托·费雷拉的观点,男性成长小说总是以主人公接受既定的价值观,融入社会而告终;而女性成长小说,总是以女性主人公疏离社会而告终,要么是死亡,要么是出走。而猎人阿尔坎如将马里阿玛带出村庄,并不是男性对女性的单向拯救,而是彼此救赎。这个结局包含了马里阿玛与猎人阿尔坎如的双重成长,更像一个乌托邦一样的愿景。猎人阿尔坎如的形象与作家米亚·科托合二为一,代表愿意推进女性解放事业,亦即全人类的解放而发声的所有人。

作为男性作家,在书写女性、为女性发声的身份认同上,米亚·科托的观点仍然具有多元性和充满质疑。作为社会人,他无法对莫桑比克女性地位较低的事实视而不见,会积极参与到推动提高女性地位的斗争中,为女性做更多争取。但从作家角度如何切入女性身份、了解女性问题,米亚·科托是有疑问的。在他看来,作家不一定要以政治参与者、政治活动者的身份进行写作。“每当有人来跟我说,‘您写的东西很像女性的声音’,我会把这当作很高的称赞。但我并不清楚知道这指的是什么:什么是女性写作、什么是男性写作,什么是女性的声音、什么是男性的声音。”米亚·科托认为,把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进行二元区分也许是虚假的,强调某个作家的作品有女性的声音或者女性写作的特质,也许是在强调这种二分法,而真正应该做的是打破这种二元区分。

“尽管我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写作,但没办法取代女性自己的声音。”米亚·科托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莫桑比克女性作家,但他也觉得有点遗憾,关于女性作家是否应该写出女性境遇之外的问题。“女性作家大部分主要关注女性生活和境遇,但并不一定要这样,这有点自我局限,如果女性作家能够有更广泛的主题会更好。奈保尔写了关于非洲的书,但并没有任何人来质疑他有没有资格写关于非洲的书。”这与他之前所说“即使是黑人,也不一定与非洲历史天然地发生联系”所持的态度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

动态

8月27日,由北京大学教授李明滨、张冰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诗词论——谢列布里亚科夫汉学论集》一书出版发布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举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负责人、汉学家罗季奥诺夫主持发布会,他谈到,2004年,谢列布里亚科夫首次倡议举行了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在第八届远东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期间,举行《中国古典诗词论——谢列布里亚科夫汉学论集》一书出版发布会,是对谢列布里亚科夫诞辰90周年的最好纪念,促使我们继续他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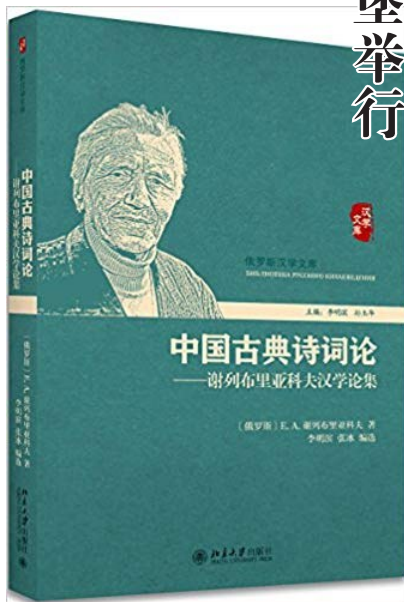
发布会上,东方学家、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杨松教授,圣彼得堡市俄中友协会长、汉学家斯托拉托克(索佳威)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部张冰主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了谢列布里亚科夫的学术成就、翻译和汉语教学、中俄文学关系等诸方面开创性的杰出成就,认为该书的出版可喜可贺,让中国读者了解到这位天才学者的学术遗产。杨松和斯托拉托克深情回顾了他们亲身经历的谢列布里亚科夫一件件鲜活、有趣的学术、生活往事,谢列布里亚科夫因为出色的研究,被誉为“俄罗斯的杜甫和孔夫子”。张冰回顾了该书的编选、翻译和出版过程,并向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东方系等赠送了该书。谢列布里亚科夫的生前同事、好友、学生,以及来自俄罗斯国内外和中国参加远东文学国际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发布会。

E.A.谢列布里亚科夫(1928—2013)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的教育家、翻译家和研究者。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研究,在对中俄文学关系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复杂的语言思想关系及其文学理论问题进行科学阐释等诸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和世界影响,填补了俄罗斯宋词研究的空白。谢列布里亚科夫著述丰厚,相关成果130余项,其中包括《杜甫评传》(1958)、《陆游的生平与创作》(1973)、《中国10世纪的诗词》(1979)等5部专著;陆游的《入蜀记》(1968)、茅盾的《动摇》(1956)等译作。他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汉学家,与中国的俄苏文学翻译界,特别是翻译家曹清华有着长久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2003年,谢列布里亚科夫获得“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荣誉教授”称号;2007年9月,获得中国作协颁发的荣誉证书,表彰其在翻译、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学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三次获得国家勋章:“荣誉勋章”(1976)、“劳动红旗勋章”(1986)、“友谊勋章”(1999)。

《中国古典诗词论——谢列布里亚科夫汉学论集》一书主要包括谢列布里亚科夫的8篇论述,分别是“诗歌的权利与精神的自由”“陆游诗中的比喻”“范成大生平”“宋诗流派问题与理学家的诗词”“儒家对《诗经》的诠释”“屈原与楚辞”“曹清华教授的生平与创作道路”“果戈理在中国”以及谢列布里亚科夫著述目录等内容,首次向中国读者全面展示了谢列布里亚科夫的翻译研究成就。

《谢列布里亚科夫汉学论集》属于“俄罗斯汉学文库”系列作品之一。为了全面系统地呈现俄罗斯的汉学成就,近年来,在李明滨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开启的“俄罗斯汉学文库”项目,内容包括“俄罗斯汉学家论集、中国文化典籍等在俄罗斯的研究论著、汉学资料文献研究工具书”等等,总计30卷,属国内首成。该项目陆续问世后,俄罗斯科学院首席研究员罗曼诺夫曾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杂志上撰文,称该项目是“中国学者系统研究俄罗斯汉学遗产的巨大创举”,“李明滨教授、他的学生和同事在俄罗斯汉学总体研究方面的努力,赢得了巨大的敬意和俄罗斯学术界的积极支持”。(世文)



《中国古典诗词论——谢列布里亚科夫汉学论集》发布会在圣彼得堡举行



俄罗斯画家维拉·巴甫洛娃为苏联作家列米佐夫的作品《卡斯托洛马和其他的童话》所作插图